

张养重生卒年岁新考

朱德慈

张养重，字斗瞻，号虞山，别号椰冠道人，山阳人。崇祯十六年诸生，入清不仕，与乡人阎再彭、靳应升共同发起并主持具有复明意蕴的诗社——“望社”，先后长达二十余年。著《古调堂集》，康熙二十二年丘象升刻本。王士禛曾激赏其《春日张水部招游江南留别同社》之“南楼楚雨三更雨，春水吴江一夜增”，为“如此好句”（《渔洋诗话》卷上）；复称其《处州山村》之“百年无与人间事，老死深山古林中”，为“今人穰穰入市者，不知世有此境”（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三）。丁晏称赞其人为山阳“唐宋以后第一诗人”，其诗“如九皋独唳，深林孤芳”（《柘塘脞录》，见《山阳诗征》卷一〇引）。金堡则更盛誉其为当时“诗坛雄伯”（《二子海外诗序》，见《遍行堂文集》卷七）。

可是，学界对于这位颇具影响之诗人的生卒年岁，迄今并无确考。笔者浏览所及，如蒋寅先生《王渔洋事迹征略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）第86页称：“张养重（1620—1680），字子瞻。”（顺及，此处“子瞻”之“子”或为误植，应作“斗”）江庆柏先生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）第407页曰“张养重，万四八——康一九（1620—1680）”。严迪昌先生《清诗史》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）卷上第120页亦曰“张养重（1620—1680）”。

以上诸说异口同声，据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称，乃源自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所引《张虞山年谱稿》。检张慧剑先生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）第454页，所谓《张虞山年谱稿》乃“丁氏钞本”。丁氏者，即晚近淮安学者、丁晏玄孙丁志安（1914—1988）。丁先生之《张虞山年谱稿》，窃虽未见，但可断定其言虞山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之说必误。

首先，《古调堂集》有诗题《山堂共学》，小序曰：“崇祯丁丑，始与阎再彭肄业新城宅……道既合，订为生死交。”诗之首句曰：“弱冠订为白首交。”案崇祯丁丑即崇祯十年（1637），由之逆数二十年（“弱冠”），是知虞山

应生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。

其次，《古调堂集》另题《阎参议画像歌》，中曰：“其时公子曰修龄，与我同学复同庚。”阎参议指晚明辽东兵备道参议阎楚璠。其公子阎修龄，字再彭。再彭生若璩，字百诗，号潜丘，乃清代著名的经学家。考张穆编《阎潜邱先生年谱》引潜丘自著《乞言小奏》，谓再彭公乃生于万历丁巳九月初十。虞山既与再彭同庚，自亦当生于万历丁巳，即万历四十五年也。

复考虞山密友蒋楫《天涯诗钞》卷三，有题《八月八日赠虞山生日歌》，叙述自己与虞山相识相交的过程，其中曰：“忆昔丙午暮春成漂流，流落转漕不用万斛之空舟。舟居非水陆非屋，云中别鹤沙边鸥。故人指点始一见，东关转徙多离愁。九月九日招我登高台，那知八月八日已过悬弧五十秋。……己酉八月八，君交五十三。”丙午乃康熙五年（1666）。既然这年虞山五十岁，则其自当生于万历四十五年。又，己酉乃康熙八年（1669），由之逆数五十三岁，也正是万历四十五年。此诗不唯交代虞山生年信息，且交代其生日为八月初八，足见其可信程度。

以上三者互证，虞山生于万历四十五年可以定讞。

至于虞山卒年，丁氏所言亦误。时贤踵其说，皆失察。考丘象升《古调堂集序》曰：“其卒也，予适抱疴陈情归里，得与虞山永诀。于易簣之前二日，起端坐，手《古调堂集》，谓：‘毕世精神，惟此而已。’予固已心诺之。”然则丘象升“抱疴陈情归里”是在什么时候呢？检王士禛应丘象升之子丘迈请求，为象升所作墓志铭，题曰《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讲邱公墓志铭》（《带经堂集》卷六九），文云：“壬戌，公念参政公（笔者案：象升父丘俊孙官山西布政使司分守冀宁道、右参政）春秋高，以病请归，省侍于舍者五年。”既然虞山卒于象升“抱疴陈情归里”之年，而象升之“抱疴陈情归里”又可确认在壬戌，那么虞山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（1682）便无可疑了。

又，丘象升《古调堂集序》曰：“其卒也……越今六年。……己巳季夏，予病卧且半岁，神情瞀乱，追忆故人生平，不能详为，略识其梗概如此。同学弟丘象升拜撰。”而《丘公墓志铭》则曰：“丙寅，参政公弃养。甫终制而公病，遂不起，年甫六十有一。……生以明崇祯己巳七月二十二日，卒以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。”两者所述象升临终状况与时间均相符。己巳乃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。由该年逆数“越六年”，亦正康熙二十一年也。

以此二者互证，虞山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同样毋庸置疑了。

还可以更进一步考索虞山之卒的具体时间。检丘象升之乡友刘谦吉《雪作须眉诗钞》卷八有《送丘曙戒寺副假归七首》，曙戒即象升之字。组诗其一曰：“秋色燕台白露微，云天相望各依依。无情最是清空唳，独向江南一雁飞。”其二曰：“非关菰菜忆张翰，陟岵情深去就难。捉鼻不须酸欲绝，同时多少侍郎官。”其六曰：“淮南小

桂傍城阴，出岫逢场自问心。那得弟兄皆拂袖，疏称将父各情深。”所谓“燕台”、“拂袖”、“陟岵”、“将父”云云，分明是说象升“抱病陈情归里”侍父，而“秋色”、“白露”、“小桂”则表明象升离别京师是在秋八月（康熙二十一年白露节气在八月初六日）。考虑到从京师到山阳的行程约需二十余日（道光十年，山阳潘德輿前往京城座师钟昌[字汝毓，号仰山]家任教，即从三月初十日车行至四月初四日，方“入彰义门，复入崇文门，至仰山夫子宅”。计耗时二十五日）（详其稿本《北行日录》，见拙编《潘德輿集》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），而象升又谓虞山卒时，其“适抱病陈情归里”，故而可以认定虞山之卒应在九月中旬。

清初遗民诗人张养重生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八月初八日，卒于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）九月中旬，享年六十六岁。

[作者单位：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]

沈德潜七言绝句刍议

陆 平

沈德潜（1673—1769），是清代中叶著名的诗论家和诗人。对他的诗论和他所编选的诗集，已有不少研究论著，但他本人的诗歌创作，一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，至今缺少专门的探讨。其实，作为乾隆时代的诗坛盟主，沈氏现存二千三百多首诗，五七言古近各体都有佳作。其中七言绝句四百九十多首，占其全部诗歌的五分之一以上，数量与质量都居第一，有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特色，有不少应予肯定可以传世优秀篇章。为此，本文试作初步的论述。

沈德潜出身于江南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的清贫人家，刻苦攻读，为谋取功名风尘仆仆，南北奔波，但科场困顿数十载，长期以授徒为生，直到乾隆四年（1739），他六十七岁时才中了进士。因此，他的生活阅历极为丰富，他深深了解和关心民生疾苦。他学习杜甫、白居易写了很多忧国忧民的诗篇。杜甫用七绝写国家大事，沈德潜也用七绝这一篇幅短小的诗歌体式反映民瘼，揭露时弊。

例如《过粥厂口号》：“设粥郊原为疗饥，残黎频触长官威。谁云不食嗟来食？得食何妨扑扑归。”诗中描写饥民为争得一碗粥吃，不得不忍受“长官”鞭答、吆喝的场景，真切生动，触目惊心，引起读者对饥民的同情与对酷吏的愤恨。另一首《沂城至蒙阴记途中所见》云：“墙围黄土路沿沙，夫把犁锄妇作家。肯信歌楼残月夜，醉教红袖拨琵琶。”由农民勤劳艰辛的生活与环境，联想到豪门贵族的奢侈逸乐。两幅画面，对比鲜明，诗人的同情与义愤流溢而出。这是对杜甫诗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人道精神和现实主义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与发扬。再如《蚕女辞》：“箔里蚕多每怕饥，蚕娘忌客闭荆扉。红蚕成茧无多日，又为邻家制嫁衣。”诗仅四句，具体形象地概括了蚕娘一年四季劳动的紧张和辛酸，表达了诗人对蚕娘为人作嫁的同情与怜悯。此诗与宋人张俞的“昨日入城市，归来泪满巾。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”（《蚕妇》）相比较，只叙事而不喟叹，诗意更含蓄。